

去年6月,复旦历史系在相辉堂举行毕业典礼。金光耀教授在致辞中说,1980年前后,李德伦、黄贻钧和陈燮阳等名家就在这里(今相辉堂南堂),多次率领乐团举行交响音乐会,为学生播下了古典音乐种子,“这是一件可以在当代教育史和当代音乐史上留下记录的事情,但在《复旦大学百年纪事》上并无一字记载。如果我们经历过的人不记住,这件事就被遗忘了,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”。

金光耀是我大学同窗,他提及的历史,我感同身受。前些日子,新校史馆展陈文案,征求我意见。我不揣冒昧,一口气提了十条。其中一条就是:改革开放后,复旦校园内掀起“交响乐热”,盛况空前。作为新校史馆,不能没有一丝反映。

几天后,撰写文案的小邱问我,那时的“交响乐热”,有没有可用来展陈的实物?这个问题,问倒了我。那个年代,没有手机、没有海报,也没有演出单,大牌名流到复旦,用毛笔写几个字,就贴在中央饭厅布告栏上,经年累月,踪迹全无,到哪里去寻找实物?

我想到了《复旦》校报。查找后才知,当年《复旦》,不定期出版。对于“交响乐热”,要么不报道,要么语焉不详。比如,1980年4月10日,《复旦》报道称:“前不久,著名音乐家、指挥家,中央乐团指挥李德伦同志,在我校举行了一次交响音乐会,讲解了中外交响乐名曲……”这个“前不久”,是指哪一天?又比如,1982年3月6日,《复旦》记述:“上海交响乐团最近在我校举行第七场校园音乐会。在曹鹏指挥下,向千余大学生介绍了在音乐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贝多芬《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》和布鲁赫《g小调小提琴协奏曲》……”这里的“最近”,又是哪一日呢?

翻箱倒柜,查阅当年日记,我终于发现:上述李德伦指挥上交的音乐会,日期是1980年3月19日;曹鹏指挥的那一场,则是在1981年12月28日。其实,当年复旦交响音乐会,还有很多场,如黄贻钧指挥上海交响乐团、曹鹏指挥上海乐团、陈传熙指挥上海电影乐团、黄晓同指挥上海歌剧院管弦乐队、陈燮阳指挥上海

芭蕾舞团管弦乐队等等,《复旦》几乎只字未提。

然而,那些年,校园里的“交响乐热”,红红火火,一直刻在我的脑海,挥之不去。

记得李德伦到校时,全校轰动。司徒汉、陈传熙和瞿维等音乐家,悉数到场。李德伦风趣幽默的讲解,引得掌声四起。那天的曲目,是德彪西的夜曲《云》和《节日》、中国琵琶协奏曲《草原英雄小姐妹》和柴可夫斯基的《第五交响曲》。演奏“柴五”前,李德伦说:“交响乐的乐趣

留住复旦的交响乐记忆

读史老张

手,“还有,‘柴五’第四乐章中间,有一个突然停顿,大家也不要急着鼓掌呀!”学生们大笑。他跨上指挥台后,忽然又转过身来:“可是,我在苏联指挥演出‘柴五’时,苏联观众也会在第四乐章中间鼓掌……”顿时,礼堂内笑倒一片。

1981年5月22日,黄贻钧率领上交到校演出。演出曲目是拉威尔的《波莱罗舞曲》,施鸿鄂演唱的歌剧选段,王晓东演奏的门德尔松《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》。那时的王晓东年仅11岁,来自上音附小。他穿着白衬衣,系着红领巾,圆圆的脸上满是稚气。他的演奏获得满堂喝彩。演出结束后,黄贻钧摸摸他的头,亲切慈祥;王晓东则频频行少先队礼,腼腆羞涩。当时,王晓东父亲也在场——他就是上交乐队首席王希立。从此,我记住了“王晓东”这个名字。1985年,他获得梅纽因国际小提琴比赛金奖。若干年后,在《参考消息》上,我读到一则外刊评论,称他是“中国的帕格尼尼”。

那时,校园里的交响乐细节,真的是不胜枚举。例如,黄晓同到校时,复旦正流行一款“复旦”徽章,方形、蓝底,校内一“章”难求(我得到的一枚,还是郭太风同学“开后门”搞来的)。演出开始前,学生代表将这一徽章别在黄晓同胸前,他非常高兴,拉着衣襟,连连向台下展示,全场欢腾,掌声雷动;上世纪90年代初,陈燮阳一度辞别上交,去香港发展。离沪前,他率上交到校演出。大家私下里说,这可能是他的“告别演出”。音乐会结束时,我亲眼看到,几位复旦女生,流下了感伤的热泪……

这一切,在复旦校史上没有任何记录。正如光耀兄所说,假如亲历者不发声,这段历史就被轻轻地抹去了。

感谢有关部门从谏如流,重视民意。几天前,小邱欣喜地告诉我,李德伦等指挥家到校演出的照片,他们终于找到了,拍摄者是新闻系校友陈小鹰。这太好了!这些照片,不仅留下了音乐大师的精彩瞬间,更是让复旦的交响乐记忆,有了一个完美的抵达。

近年来,家乡樟林的古港遗址被列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,其文物和历史风貌得到一定的保护和复原,附近的秦牧故居也随之开放给游人参观。秦牧先生是我的家乡人,其故居离我家步行不过十分钟。

秦牧先生生于香港,后随父母到了新加坡,后来又回到家乡樟林,在这里度过了五年的光阴。新中国成立后,秦牧先生长住广州,我祖母林玉辉每次从香港回乡,常会在秦牧先生的姐姐林玉娥女士那儿住上一阵子,她们是亲戚。我父亲到广州接我祖母,有好几次碰见秦牧先生,听我祖母“阿书阿书”地喊着他的乳名,也用家乡话跟他闲聊几句,过后就没再联系了。

秦牧先生的作品我读得不多,念初中时,父亲要我好好读读《艺海拾贝》,说作者知识渊博,引古喻今,涉笔成趣,对提高作文水平很有好处。我后来又从报刊上读了他的个别篇什,包括他专门为樟林而写的《故乡的红头船》等。秦牧先生虽然待在樟林的时间不长,但对这里的风情事物却熟稔于心,且颇为怀恋,这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来。据说他的寓所会客厅,常年挂着澄海籍著名国画家蔡仰颜的一幅《林檎图》,林檎是樟林有名的特产,秦牧先生每天看一看,或许能一解乡愁。

一朵花惊艳一座城。盐城人素以枯枝牡丹为骄傲。市南20多公里处坐落着一座2000多年历史的古镇便仓。这里的枯枝牡丹,主干似饱经风霜、憔悴欲朽,鲜枝可燃,享誉古今。

游人走进便仓枯枝牡丹园,沁人心脾的花香便扑鼻而至,微风吹过,一朵朵牡丹在细细茎上摇曳的身姿如同翩翩起舞的少女。便仓枯枝牡丹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人文底蕴。清代小说《镜花缘》记述:“如今世上所传枯枝牡丹,淮南便仓最多。”据史籍记载,这里的枯枝牡丹原产于洛阳。北宋末年,苏州人卜济之,曾任陕西参政



船行花海间 (插画) 郑丽萍

乡愁 厚 圃

樟林是侨乡,也是乡愁弥漫的地方。我父亲从我一出生好像就料到,哪一天我会离开家乡,故此翻遍字典,只为了给我取一个带有“宀”的名字,他不喊它宝盖头,而是喊它“家字壳”。我以为他弄错了,查了一下,“宀”最早见于商代甲骨文,“其古字形像房屋的侧视形,本义即房屋,引申为覆盖。”我于是明白了父亲的用心,他希望我这个长子今后能留在他们身边,起码不要离家太远。可是报考大学时,他又一反常态,鼓励我尽可能走远点,因为只有这样,才能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,开阔眼界。可怜天下父母心啊!

其实啊,有人的地方,几乎都有乡愁。只不过不同的时间节点、不同的对象,表现出来的方式和感受也大不一样。比如节假日,中国人历来重视过节团圆。比如亲人在国外,离家越远思念越深。我女儿每次出国,总要带两只大箱,其中一只满满地装着各种好吃的,也包括她小时候爱吃的零食。去年底,我太太跟她在欧洲会合,带得最多的不是自己的衣物,而是给她的食物,来自祖国故乡的美食,慰



藉的可不仅仅是味蕾,肠胃妥帖了,家也就近了。

乡愁自古就有,《诗经》里有,《楚辞》里也有,写得最早又好的莫过于《九章·哀郢》中的名句:“鸟飞反故乡兮,狐死必首丘”。禽兽尚能如此,何况人乎?屈原的可贵在于以此为喻,将故土难离的依恋升华至家国情怀,情感深挚,具有很强的感召力。窃以为,能够让人断肠的诗词可以不像“千岁鹤归犹有恨,一年人住岂无情”这样利用典故的运用和意义的引申,也可以不像“感时花溅泪,恨别鸟惊心”这样

采用拟人和夸张的修辞手法,而是如“逢人渐觉乡音异,却恨莺声似故山”一般,诚实地呈现人语、莺声的异同,不作雕饰,朴实无华,反而更能穿透内心直抵人性,感人至深。

对于如何缓解乡愁,我曾试图通过小说创作来寻求答案。在文本中,我将这种看不见、摸不着的东西具象为一种灰色、让人近乎窒息浓雾,它如疫病般能够传染,如果任其无所限制地蔓延恶化,整个港埠整个平原的人们将被怀旧的情绪所裹挟,“会因丧失活力而回到最原始最无助的洪荒状态,被难以逆转的旧时光所湮灭”,而医治这种思乡症的最有效的药物,就是爱与欢乐。

枯枝牡丹天下奇

管苏清

公。宋亡后,为避战乱,举家迁至东溟(今便仓),携洛阳红、白两株牡丹植于园内。卜氏后裔卜元亨写下《戎归》一首:“丈夫志远遍天涯,一跨辽东忽到家,荒径尚存苍翠柏,故园尤有牡丹花。”

晚上游园,风携着阵阵牡丹特有的芳香吹过来,轻拂着面庞,人们的步履也会轻快如仙。月色如水,洗净了花儿白天的艳丽,有一种慵懒的美。阳光下的牡丹雍容华贵,有一种只可远观不可亲近的距离美。而此时,在如水的月色下,牡丹带着洗尽铅华后的自然和亲切,透着不胜娇羞的妩媚,让你不由得放松心情。花儿在晚风吹拂下,不经意地蹭着游人的衣角,让人真想亲吻一下它的娇容。在朦胧的月色下注视它们,那份喜悦,那份柔情,分明是那样熟悉和亲切。

古时便仓,几乎家家

萱草花和母亲节

王丽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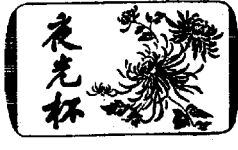
每年5月,母亲节这个充满温情的节日,总会被提起。在一个家庭,母亲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。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一想起母亲,就能感受到爱的温暖。

“凯风自南,吹彼棘心。棘心夭夭,母氏劬劳。”对于母亲,中国人在《诗经》中就已经表述过。只是中国人比较含蓄,往往将对母亲的爱形诸于文字,付之以行动,未曾想到要用一个仪式表达。随着文化的交流,母亲节这一天,很多商家会进行购物送康乃馨的促销,孩子也会买康乃馨郑重地送给母亲。近几年,由于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不断深入,母亲节自然更需要中国味道,中国的母亲之花当然非萱草花莫属。

萱草自古以来就受我国人民喜爱,人们将其栽植于庭前屋后。萱草细长的枝顶端会开出橘红或橘黄色的花,花朵仿佛一个个跳跃着火焰的灯盏,闪烁着鲜亮的光芒。《博物志》记载:“萱草,食之令人好欢乐,忘忧思,故曰忘忧草。”的确,看着亮丽的鲜花,心情自然会好。吹花嚼蕊,更是忘忧。萱草很早见诸古诗词中。《诗经·卫风·伯兮》记载:“焉得谖草,言树之背?”“谖草”即萱草。后来孟郊的《游子》诗:“萱草生堂阶,游子行天涯;慈亲倚堂门,不见萱草花。”萱草被赋予了“母亲的代称”这一特定文化含义。古时当游子要离家远行时,就会在北堂种一些萱草,希望母亲会因为照顾萱草而忘记对孩子的思念。民俗中母亲的生日称为“萱辰”;母亲住的屋子又叫“萱堂”;母亲的别称为“萱亲”。

如今,关于萱草的文化记忆渐渐被唤起。电影《你好,李焕英》把《萱草花》作为主题曲。其中歌词这样写道:“遥遥的天涯,萱草花开放,每一朵,可是我,牵挂的模样,让它开遍我等着你回家的路上,好像我从不曾离开你的身旁。”整首歌没有直接提到母亲两个字,但从头到尾饱含着对母亲深沉的爱。当你耳边响起这样的旋律时,有关萱草花的思绪不知不觉就萦绕于心了,这就像母亲的爱,细微如水,却盈满于怀,似风无痕,却容纳万象。

在母亲节,送母亲一株萱草花,祝其康,愿其寿,开心快乐在心头。这样的表达很浪漫,也很中国。



餐桌是家里最重要的一张桌子,中式的以前多是正方形,名曰八仙桌,意为可容八人用膳。后来圆桌渐渐流行,大的中间还有一个圆形转盘,专供放菜之用。这个小发明我觉得比什么无人超市、刷脸支付等大发明实惠得多,它给食客用膳时带来极大的方便。

一般中式餐桌就是用来放菜肴放餐具,很少有在餐桌上放上很多装饰、花卉之类,即使是宴请。那是因为一般中式宴请的菜肴非常丰富,热盆、热炒、大菜、汤、点心、水果、酒、饮料等放满了整张餐桌,哪有地方放装饰品。放在桌上的,要都可以吃的,除了餐具。客人来赴宴也总会带上礼物。礼物轻重根据客人与主人关系,以及时间点、宴会目的等,有很大上落。开宴之间,主人常为客人夹菜,客人也会擅自离座跑去给主人敬酒。气氛热烈,充满欢笑。

相比西式餐桌风俗,可谓完全不同。西式餐桌全是长方形。餐桌的布置比较考究,尤其在宴请时,会铺上一层漂亮的台布。中间一定放上鲜花,甚至几个精致的蜡烛台,烛光耀耀。全套漂亮的餐具。高雅与艺术感,是他们追求的。不过再漂亮的东西,也

不能吃噢!相比中式餐桌,除了餐具,都是可以吃的;放上来就是为了吃,不是为了看。重点有点不一样。

美国人的餐桌,布置好后,中间会放些面包、黄油、调味品等。由于西式家宴菜肴一般比较简单:浓汤、生菜色拉、正菜、甜点、酒、饮料、咖啡。每次主人完成一道菜后就分给所有食客。然后就拿走了。食客各自

正方形与长方形

方正明

吃自己的,中间没有供给食客们夹菜的菜盆放在那里,所以中间就可以放上鲜花了。客人们来赴宴也会带来礼物。一般很简单:一瓶酒或者一束花或者一盒巧克力。用餐期间,人们轻声交谈,从来不会跑来跑去给某人敬酒。喝酒大致中间碰下杯即可。相比中式的,西式的比较冷静、优雅,讲究形式。两种餐桌风俗各有长短。

中式餐桌风格里有一点最要改进的,就是一桌人,甚至一桌陌生人一起用膳,都用

一双筷子从自己嘴里抽出再去中间夹菜,重复又重复。这无疑增加了疾病传播风险。最近我遇到几家上海大饭店给用膳者每人两双筷子,我特高兴。不过很快我发觉基本行不通。除了我很熟练无混淆地使用两双筷子,其他人经常不习惯使用。即使两双颜色不同,一双公,一双私,可他们记不住哪双是公,哪双是私。用好也不放固定位置。轮流着用等于不分。有的干脆用一双筷子解决一切,反正也没人会讲。的确,我看到也只能默默无声。我感谢这些饭店所做的努力,相比某些饭店他们根本不在乎。有一家,当我要求他们多给些筷子时,服务员用眼睛瞪我几秒钟,仿佛是说:你是来吃饭的还是来吃筷子的?

要改变这个坏习惯还得靠卫生部门、饮食行业多多宣传,食客也多多配合,才能渐渐奏效。

十日谈

餐桌的氛围

责编:刘芳

也许,还是八仙桌简单而干净。我们常常为了生活更缤纷,而做出了过分的选择。请看明日本栏。